社会经济

清代尚贤硃卷所见蒙古旗人的社会生活

张　杰

[**摘要**] 本文利用近年出版的最新史料，以东北蒙古旗人尚贤会试硃卷为主，论述了清代 300 余年尚贤家族的社会生活。通过尚贤家族与汉族多次联姻，由游牧为主向农业生产转变，凭借积累财富培养子孙受教育等大量事实，对清代东北蒙古旗人社会生活及其变迁，从新的视角做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

[**关键词**] 清代　尚贤硃卷　蒙古旗人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 (2001) 03 - 0035 - 05

The Social Lives of Mongolian Bannermen in the Qing Dynasty as Represented in Shang Xian's Vermilion Exam Paper

Based on newly published materials, especially the Vermilion Exam - Paper of Shang Xian, a Mongolian Bannerma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ocial life of Shang Xian's family over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years.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numerous marriage alliances with Han Chines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nomadism to agriculture,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for the education of descendants. These new resources allow the author to draw new conclusions on the social institutions of Mongolian Bannermen in the Northeas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ir way of lif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关于清代八旗制度下蒙古旗人的研究，向来成果较少，至于东北蒙古旗人的社会生活，由于历史资料极其缺乏，目前为止几乎无人论及。台湾成文出版社 1992 年出版了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一书，共 420 册，本文即据该书所载同治进士、东北蒙古旗人尚贤硃卷履历为主要资料，并以尚贤家族为具体实例，结合其他文献，试论清代蒙古旗人在婚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变化及社会影响。

一、家世婚姻

尚贤，姓巴羽特氏，生于道光二十五年 (1845) 十一月，隶盛京 (今沈阳市) 驻防正白旗蒙古。

关于尚贤的家世。其硃卷履历谓："始祖巴冷，国初由科尔沁部内附"①。蒙古科尔沁部系元朝皇室旁支，元太祖铁木真弟哈萨尔的后代。明末时科尔沁部游牧地在东北嫩江流域，努尔哈赤兴起后，采取与周围蒙古各部王公联姻的方式，来争取骁勇善战的蒙古族的支持。科尔沁部最先与努尔哈赤联姻，万历四十年 (1612)，科尔沁部明安贝勒送女与努尔哈赤为妻；二年之后，科尔沁部"蟒孤贝勒，送女与太祖四子皇太极贝勒为婚"②。由于科尔沁部与后金政权的亲密关系，因此不少蒙古牧民通过科尔沁部投奔后金政权，尚贤家族始祖巴冷就是其中的一个。

关于巴冷"内附"后金的时间，尚贤硃卷

[**收稿日期**] 2001–01–10
[**作者简介**] 张杰 (1954—)，男，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沈阳 110036

履历笼统地写作“国初”。清乾隆朝编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一书时，将旗人入旗时间分为“国初来归”、“天聪时来归”、“来归年份无考”和“系康熙时自科尔沁撤回”四种。据此推算巴冷“国初”入旗，应在努尔哈赤时期。巴冷所属的巴羽特氏（史书又作把岳忒氏、巴约特氏或巴禹特氏），是蒙古族中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氏族，明朝人陶宗仪记载蒙古族有 72 个著名氏族，其中就有“巴约特”氏族[3]。民国《沈阳县志》卷九中载：蒙古巴禹特氏“天命二年内附，以族巨，分隶满、汉各旗。惟属正白旗仍隶蒙古，至今传十余世”。由此可见，巴羽特氏家族最初被编入了满州正白旗，天聪九年（1635）后金编制蒙古八旗时，从满州八旗中划出“仍隶蒙古”。巴羽特氏“族巨”这一点，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一书中可以得到佐证。据该书《凡例》“满洲旗分内蒙古、尼堪、台尼堪、抚顺尼堪姓氏，照满洲例，有名位者载，无名位者删”[4]的有关规定，查该书卷 68 记载“国初来归”的蒙古“把岳忒氏”中，就有 20 余个著名家族，分别隶属满洲各旗。被编入八旗蒙古正白旗的巴冷这一支，既没有“从龙入关”的显赫军功，也没有做过官宦的族人，故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不见记载。

清代驻防八旗蒙古中普通旗人的婚姻情况，因为文献中鲜有记载，迄今为止有关研究八旗制度与蒙古史的论著，皆未能予以说明。而尚贤硃卷履历，为我们提供了其家族婚姻的详细记录。在清代，蒙古旗人巴冷的后代长期处在社会底层，也反映在其直系亲属的婚姻关系中。按照清代士人刊刻硃卷的固定格式，中式者的直系亲属，“祖宗三代兄弟之官阶封典著述，皆于其名下载之，妻之父兄有科名仕宦者，亦附注于妻姓氏之下”[5]。尚贤始祖巴冷到父亲巴哈 8 代人的婚姻情况如下：

始祖巴冷娶朗佳氏，八代祖吉伦泰娶胡佳氏，七代支祖莫力根娶马佳氏。关于这三代婚姻“外家”详情，尚贤在硃卷履历中无具体记载。太高祖白士胡朗娶刘佳氏，“外家部属人，世居储堡，距柳塘沟仅数里。（尚）贤通籍后诣访之，亲属均式微渺然，村落庐舍荒凉，祇增慨慕耳”；高祖巴力当阿娶闻佳氏，“外家承德县民籍，始居黄花店，今迁高丽屯。亲属颇众，迄今庆吊往来不绝，想见高祖妣德度焉”；曾祖札隆阿娶田佳氏，“外家户部旗人，世居省南三十里詹家堡，今移省城”；祖父德兴额娶沈佳氏，“外家承德县民籍，世居省南庙尔沟，亲属故少，今止存遗族”；父亲巴哈取刘佳氏，“外家承德县民籍，外祖讳义，有子二，长讳成德，次讳成玉……咸丰初元，两征奉省兵，家严均于役。家慈教养兼施，诸兄学赖以不废，舅氏成德亦与有力焉。舅已殁，子四人：长名景春，次讳芳春，次讳锦春，次名丽春，均服先畴，称小康焉”。[6]

从尚贤硃卷履历关于其家族 8 代婚姻的珍贵描述，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尚贤家族虽系八旗蒙古旗人，但其婚姻关系主要取决于社会地位。从始祖巴冷到父亲巴哈 8 代联姻时期，因其家族一直属于社会地位低下的普通旗人，嫁到尚贤家族的女子，也都来自普通百姓之家。第二，尚贤家族的 8 次联姻，并未受到民族和旗籍的限制。在有明确记载的 5 次婚姻中，其中有 3 次是与属于“承德县民籍”的汉族联姻，且不是发生在清末。最早的一次联姻为高祖巴力当阿娶闻佳氏，当在乾隆年间。这就有力地证明，清代所谓“旗民不通婚”之说，在下层民众中根本不能成立。第三，在尚贤的 3 代“民籍”外家中，虽无一人做过官或取得过科举功名，然而对尚贤家族社会地位的提升，产生过一定影响。如尚贤的舅父刘成德兄弟，尽管是普通农民，对尚贤“诸兄学赖以不废”，迅速掌握汉族文化，有较大的帮助。

二、生产活动

清代康乾之际，东北驻防八旗兵丁尤其是蒙古旗人，是否也像京畿地区八旗兵丁一样，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清代的蒙古族，仍然从事以游牧为主的生产活动，被纳入八旗制度下的蒙古旗人，过上定居生活后，又是如何维持他们日常“生计”的？这都是一些迄今为止无人论述的问题。而尚贤在硃卷履历中，对他的家族先辈的生产活动，每一代都做了详细描述，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

了准确的答案。

尚贤家族自始祖巴冷起，“世居省（今沈阳市）西南、厢红旗界柳塘沟”。巴冷之子为八代祖吉伦泰，“生而仁厚，善治家，支祖兄弟咸敬惮之。迄今各族田庐规画井然，悉祖之经营在焉。旗仆重游牧，习骑射，故垦荒较少，通计内仓红册地五百亩有奇”⑦。红册地指雍正初年，清朝在盛京地区登记注册的八旗兵丁所开垦的土地，未登记的称旗余地。吉伦泰与妻胡佳氏有子四人，在保持原有“重游牧”习俗的情况下，开垦的红册地有 500 余亩，因此在其后代心中留下“善治家”的赞誉。

尚贤七代支祖莫力根为吉伦泰长子，吉伦泰去世后，他的四个儿子分家自立门户。长子莫力根与次子达凌阿住村东，三子三格与四子五什住村西。莫力根自幼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闻名，因而在兄弟四人分家时，“悉以良田让诸弟，以故产益薄”。本来分到的土地财产就少，莫力根又不善于经营，他去世后“所遗者茅屋数间，仅避风雨而已”。莫力根与妻马佳氏有子二人，马佳氏嫁莫力根后，家中经济收入每况愈下，靠马佳氏勤俭节约勉强维持生活。

尚贤太高祖白士胡朗，“有膂力，善骑射，邻里无赖咸畏之”。白士胡朗为维持生计充当旗兵，“晚年辞伍归田，淡泊自处，七旬后精神尤健，年八十余无疾终”。白士胡朗与妻刘佳氏有子二人，他出外当兵领饷，妻与子在家种地放牧，过着比较稳定的生活。尚贤高祖巴力当阿未出外当兵食俸，与妻闻佳氏及三个儿子辛勤劳动，“持家以俭，用能小康”。尚贤曾祖札隆阿，“性倜傥，好施与，邻里亲故急难者辄扶济，由是用日蹙”。札隆阿的慷慨大方造成了家庭生活窘困，幸亏他充当旗兵有俸饷收入，妻子田佳氏又“能尽妇职，克勤克俭襄理家政，故境虽艰而不致乏教”。

尚贤祖父德兴额与父亲巴哈，在改变家族艰苦生活中起了关键作用。尚贤家族到祖父德兴额这一代时，由于家族人口愈来愈多，其祖居地柳塘沟已是“狭不敷居”。以“善治家”闻名的德兴额当兵退伍后，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动，率全家离开世代居住的柳塘沟，迁移到距盛京城南 35 里荒地较多的鲍家台。后来证明，这次迁居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德兴额的妻子沈佳氏，在其中起了极大作用。沈佳氏生有四子，“自移居鲍家台，督织课耕，尤极辛苦，年五十五岁以劳致疾弃养，时道光二十七年”。尚贤父亲巴哈于“咸丰三年（1853）随征直隶、山东，以擒贼功蒙赏六品军功”。光绪元年（1875），巴哈补放辽阳巴尔虎骁骑校，七年，补放佐领，历双榆树台官，稽查三汊河税务、发库边门税务，将军衙门户司行走兼管房税，署蒙古左右翼协领。⑧

以上尚贤家族 8 代人的生产活动，据尚贤祖母沈佳氏弃养“时道光二十七年”这条记载推算，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始祖巴冷与八代祖吉伦泰为头一期，生活年代相当于明末至康熙中期，那时他们的居住地周围，有大片的荒地和草场，巴冷父子过着半农半牧的富裕生活；七代支祖莫力根和太高祖白士胡朗父子为第二期，生活年代约在康熙末年至乾隆中叶，因分家后不善于经营农业，莫力根父子家庭经济生活呈下降趋势；高祖巴力当阿和曾祖札隆阿父子为第三期，时间大致在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巴力当阿父子时家庭经济收入呈现进一步下降趋势，其后代甚至因“狭不敷居”，而难以在原居地生存；祖父德兴额与父亲巴哈为第四期，德兴额移居鲍家台垦荒成功，经济收入大为增加，巴哈又以军功升至署蒙古左右翼协领，充当税务官员，其家族由清初的普通旗兵跃升为地主兼官宦之家。

尚贤家族在清代 200 多年的生产活动，在清代东北蒙古旗人中颇具典型性，我们从中可以归纳出三个特点：首先，从游牧为主转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蒙古族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尚贤家族被编入八旗蒙古驻防盛京之后，过上了定居生活，其生产方式也从游牧开始向农业转变。尚贤家族先人最初还保留了“重游牧”的传统，在清初一段时间里垦荒较少，其后代逐渐以土地为主要收入来源，成为力田起家的经营地主。其次，仗义疏财而不善经营。蒙古族是一个缺乏商品意识，而又豪爽大方的民族，如尚贤支祖莫力根分家时，“悉以良田让诸弟”，自家仅剩几间茅屋；曾祖札隆阿喜好施舍邻里，“由是用日蹙”。即使有“善治家”之称的吉伦泰和德兴额两人，前者实际上未能抓住时机适时经营农业，以致给后

代留下“垦荒较少”的遗憾；后者移居鲍家台垦荒成功的关键，是其妻沈佳氏“督耕课织，尤极辛苦”的结果。第三，习骑射当兵领饷，是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来源。蒙古族是一个长于骑射的民族，东北驻防八旗蒙古仍然保持这一优良传统。就尚贤会试硃卷履历明确记载，“精骑射”的有八代祖吉伦泰、高祖巴力当阿两人，充当旗兵的有太高祖白士胡朗、曾祖札隆阿、祖父德兴额、父亲巴哈四人。

三、文化教育

东北地处边疆，文化教育长期落后于内地，蒙古族更是如此。清朝兴起于东北，入关后首先在北京设立专供八旗子弟读书的各类官学。自康熙年间起，又相继在东北各驻防城建立八旗官学。盛京八旗官学设立于康熙三十年(1691)，是年还设立八旗义学，教授该佐领内未入官学的10岁以上幼童读书，“满洲旗分幼童，教习满书满语；蒙古旗分幼童，教习满洲、蒙古书，满州、蒙古语；汉军幼童，教习满书、满语”[9]。

如果相信清代官书的上述记载，似乎东北八旗子弟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不仅满洲八旗子弟，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子弟也是如此。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贫苦的普通旗人子弟，根本没有条件读书学习。尚贤在硃卷履历中，对其家族历代男姓人口详细记录如下：

始祖巴冷1人；八代祖吉伦泰1人；七代支祖莫力根，兄弟4人；太高祖白士胡朗，胞兄弟、堂兄弟等7人；高祖巴力当阿，胞兄弟等11人；曾祖札隆阿，胞兄弟、堂兄弟、从堂兄弟、再从堂兄弟等14人；祖父德兴额，胞兄弟、堂兄弟、从堂兄弟、再从堂兄弟等计17人。

以上列名尚贤家族7代计55人中，既没有一人受教育，也没有一人做过官。尚贤说其祖父德兴额“精骑射，隶行伍后数有功。以不习汉文，为人沮抑，未能上进，同旗多惜之”[10]。这段记载可从侧面证明，其他54人都与德兴额一样，没有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因此也就没有“上进”做官的机会。

清代文化教育以读书应考为主要目的，诚如潘光旦、费孝通在《科举与社会流动》一文中所说，只有“地主或其他多少有些经济能力的人”，才有条件受教育和参加科举考试。[11]就尚贤家族而言，从始祖巴哈到德兴额7代人，其经济条件极不稳定，甚至经常过着物质匮乏的艰难生活。直到德兴额夫妇移居鲍家台之后，时好时坏的经济状况才发生了彻底变化。从尚贤对其祖母沈佳氏“督织课耕”的描述来分析，不难看出沈佳氏并非直接参加生产劳动，而是一位田间农作和家庭副业的组织者和指挥者。道光年间，正是关内流民大批进入东北之时，德兴额夫妇就是靠雇佣流民垦荒致富的。

德兴额因本人不习汉文“未能上进”的教训，认识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而不断增加的财富，又为他培养后代受教育提供了条件。德兴额有4个儿子，长子巴哈“知书善骑射，尤重文学”；四子庆龄“工书、善骑，早知名，赍志殁”。他们是尚贤家族的第一代受教育者。巴哈同其父一样从军立功，但他因为受教育有文化，官至署蒙古左右翼协领。巴哈从受教育中获益，更加重视子孙后代的读书学习。巴哈的4个儿子都有相当的文化水平，长子尚志，“业儒，积学早殁”；次子尚德，“正白旗骁骑校”；四子尚义，“业儒，由俊秀援例候选京旗笔帖式”[12]；三子尚贤，尤其是诸子中姣姣者，同治十三年（1874）中进士时，年仅29岁。

尚贤家族的文化教育状况，基本上是清代东北蒙古旗人文化教育的缩影。首先，八旗蒙古在东北区域文化教育的发展中，明显处在不利的地位上。清代东北满、蒙、汉三大民族中，汉族文化始终处在领先地位，旗人参加科举考试用汉文，更加强了汉文化的地位。清前期东北各驻防城中设立的八旗官学，学习内容规定为“国语骑射”，实际上是满文学校，因此满文化在东北也一度得到相当发展。东北各驻防城中，仅吉林城（今吉林市）设有惟一的蒙古学，供八旗蒙古子弟“习蒙古文，骑射”[13]。其他驻防城的八旗蒙古子弟，要读书就要去八旗官学学满文。尚贤家族有文化者少，与东北蒙古旗人文化教育条件的落后是一致的。其次，必要的经济基础是受教育的先决条件。蒙古族长期从事游牧生产，居住在驻防城周围的蒙古旗人生产方式转向农业生产，有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尚贤家族经历了自吉伦泰到德兴额几代人的努力，才摆脱困境走上富

裕之路，为子孙创造了学习条件。而在八旗蒙古旗人中，他们只能是极少数而已。又次，清代文化教育以应考做官为其终极目标，东北蒙古族本无科举传统，八旗蒙古子弟即使有机会入官学读书，学习的是满文，参加科举应试又必须用汉文，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八旗蒙古子弟学习应考的难度。

四、社会影响

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社会影响，往往与其家族的社会地位成正比关系。清代东北八旗蒙古考取进士，位至高官者不多。盛京城作为东北中心驻防城，据民国《沈阳县志》卷九《人物志》记载，出身八旗蒙古者仅占 5 人，其中尚贤家族占了 3 人：尚贤本人，他的儿子贵璋及女儿莲生。尚贤家族在盛京地方真正产生较大社会影响，是在尚贤中进士做官之后，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官廉洁奉公，以敢言直谏知名。光绪八年（1882），尚贤奉命赴青海吊唁扎萨克多罗郡王。同行的正使为公爵上成，年方 17 岁，至青海后假借朝廷之命，向当地王公索要骏马。尚贤得知后，立即面见上成，责备他“为国戚大臣，身膺使节，奈何强索人马？”上成不得不将骏马退还。中法战争期间，主战的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因福建水师马尾惨败被弹劾。尚贤与张佩纶素无交往，毅然独自上疏，“力请保全孤臣，以励士气”，张佩纶因此被从轻处分。⑭

第二，关注民众疾苦，减轻“牒差”费用。清朝皇室族谱称为玉牒，每十年纂修一次，由宗人府负责缮写两部，一部储藏于京师皇史宬，另一部储藏于盛京敬典阁。玉牒修纂完毕，由礼部派大员专程护送到盛京，称为“牒差”。护送官员打着皇上钦差招牌，沿途敲诈勒索，鱼肉百姓，所经道路，“经费徭役，郡县苦之”。尚贤任内阁学士时，利用光绪帝亲政求言之机，奏请核实酌减“牒差”费用，以苏民困。他的建议为清政府采纳，规定以后“牒差经费不得过十四万”两白银，百姓的负担得以大为减轻。⑮

第三，为地方官献计献策，维护治安，稳定人心。光绪十八年（1892），尚贤升任驻藏帮办大臣，未上任而父死回籍守丧。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军在战场连吃败仗，营口、海城相继为日本侵略军攻陷，盛京城中人心惶恐。广东陆路提督唐仁廉奉命赴盛京帮办军务，他到达盛京后，欲在城墙上设大炮守城，这无异于把战场引入城内，弄得城中大乱，百姓纷纷搬家以避战火。总督裕禄阻止唐仁廉被拒绝，于是劝告他征求在籍守丧的尚贤意见。在尚贤建议下，唐仁廉下令“移前军于虎皮驿，城中人心始安”。中日停战议和后，盛京城内集聚大批无粮的难民，尚贤又力请唐仁廉、裕禄“开仓赈济，全活无算”。⑯

此外，尚贤在赋闲期间，还利用其社会影响，为家乡办了不少实事。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受奉天将军依克唐阿聘请，任沈阳萃升书院主讲，与进士李维世共同讲学，“宏奖风流，极一时之盛”，为地方培养了许多人才⑰。八国联军侵华后，造成东北土匪横行，尚贤被各界推举，负责盛京城南守望局事宜。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亲自出面筹饷置械，做到不用官府一文钱，不错杀一个人，维护了社会安定，赢得人们的赞扬。尚贤家乡的鲍家洼子石桥，也是在他四处奔走下募捐修成的。⑱

①《清代硃卷集成》第 37 册，第 127 页。
②《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③《辍耕录》卷一，《氏族 蒙古七十二种》。
④《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第 5 页，辽沈书社 1989 年影印本。
⑤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 87 页，三联书店 1958 年出版。
⑥⑧《清代硃卷集成》第 37 册，第 127 页 - 134 页。
⑦《清代硃卷集成》第 37 册，128 页。
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
⑩《清代硃卷集成》第 37 册，第 131 页。
⑪见《社会科学》第 4 卷第 1 期，清华大学 1947 年出版。
⑫《清代硃卷集成》第 37 册，第 132 - 133 页。
⑬萨英额《吉林外记》卷六，《满学》条。
⑭⑯民国《沈阳县志》卷九，《尚贤》。
⑮《奉天通志》卷一百九十三，《尚贤》。
⑰民国《沈阳县志》卷四，《附萃升书院》。
⑱《奉天通志》卷十一，《津梁》。